

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变化^{*}

马润凡

摘 要：政治认同反映了公民对政治客体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其要素及形态的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政治安全状态的性质。多向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不但拓展了政治认同生成的空间，而且使政治认同主体构成的多元层化、认同来源的交互渗透、认同序列的复杂多变等特点更为凸显。在西方“认同霸权”思维惯性和政治意图的支配下，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影响并刺激着发展中国家安全治理的需求。这就要求，一要树立治理的大数据思维，推动政治认同建构和整合的理念创新；二要调适治理方式，发挥和强化民众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的大数据辐射效应；三要增强治理的民众需求导向，促进政治认同机制的分类建设；四要挖掘历史记忆，增进政治认同的经验感知。

关键词：网络空间 政治认同 国家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 (2018) 03-0049-63

认同是行为者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具有规范作用，影响并决定行为者的安全。政治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普遍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资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政治认同不是一劳永逸的，受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具有全球性、复杂性、动态性、互联互通性等基本属性的网络空间形成，并形塑着政治认同的基本态势，而且使政治认同的衍生空间、主体构成、来源机制、序列变化等呈现新的特点。这意味着，在

^{*}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空间国家大数据主权安全保障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5BZZ007）、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14-CXTD-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河南省重点学科政治学团队专家。

网络空间中,国家安全治理除了要关注由机器、技术代码组成的物理层的演进外,也不能忽视扮演不同角色和功能的行为体间的互动及其互动中政治认同态势的发展变化问题。

一、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变化问题

政治认同是一种综合性的、递进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过程,是指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对国家、政党、政治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价值正当性判断后而形成的认知、情感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觉维护和支持政治客体的取向和行为。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坚定人们的政治价值理念,激发人们制度化参与的内在动力,增强人们对政治发展道路选择、政治制度运作、执政党能力的高度信任和行动支持,进而有效巩固政党执政和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可见,政治认同不仅是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更是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政治资源。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认同与安全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构成性关系。认同与安全都是行为者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行动者的安全取决于行动者的认同”。^①认同具有规范作用和构成作用,其规范作用通过规定适当行为的标准来规范约束行为,其构成作用则可创造新的行为体、利益和行为的类型。^②行动者的认同改变,将直接影响和改变安全的性质和程度。

受国际国内因素、观念性因素、历史实践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和信息数据获取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在社会、个人与互联网的互动演进中,网络空间出现了。网络空间的出现打破原有的时空概念和信息孤岛,驱动着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突破层级体制的限制,^③使各类行为体能够相对平等地、自由地共享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网络技术扩展和穿透度的日益增强,正冲击并建构着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互动方式。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交互性、开放性、匿名、平均主义、韧性等属性,^④对于网络

^①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② E.H. Erikson, *Identity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 p.17.

^③ [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论、网络和网络社会”,载曼纽尔·卡斯特主编,周凯译:《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页。

^④ Jeremy Malcolm.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Wembley,

空间中政治认同的动态变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作为网络空间最重要的信息环境,被创造、存储、共享的网络空间大数据,正以其“规模巨大、类型复杂、产生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点”^①冲击并改变着政治认同的传统逻辑和认同态势。具体来说,它改变并形塑着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拓展了各个行为体政治认同的空间,而且使政治认同主体构成的多元层化、认同来源的交互渗透、认同序列的复杂多变等特征更为凸显,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新空间汇总产生另一层的文化集体认同”^②。同时,在具有互动和演进特性的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间的正向政治认同有利于维护安全,并能够使已经发生的危机良性转化;负向的政治认同则对安全维护产生消极影响。

由此,网络空间中处于动态变化的政治认同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进而刺激着国家安全的治理需求。预见未来是网络空间大数据的核心价值。网络空间大数据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但它自身也正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其不但拓展了政治认同的空间,而且增强了政治认同的主体构成、来源机制和认同序列等向度的变化轨迹和规律的可视化程度,为有效建构政治认同、优化国家安全治理的面向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手段。在网络空间大数据挖掘处理技术迅猛发展和“数据治国”治理理念提出的当下,如何把握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变化的特点,及时化解政治认同风险因素,增强和提升政治认同的整合力,将成为国家安全有效治理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变化的特点

(一)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衍生的空间持续拓展

认同形塑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并受行为体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政治认同的生长经历了基于血缘、地缘等封闭性空间到意识自觉与权利认知等开放空间的变迁和演绎。^③互动互联的网络空间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认同的变化。网络空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人们时空观念和身份的限制,塑造了人类政治生

Australia: Terminus press,2008, p.8.

^① 杜小勇,冯启娜:“‘数据治国’的三个关键理念——从互联网思维到未来治理图景”,载《学术前沿》2015年第2期,第49-61页。

^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③ 曾楠:“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变迁图式”,载《南昌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8-12页。

活新景观,将政治活动场域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①。具有主动意识的行为体之间的沟通、经验、观念、意识甚或权力由现实空间开始向网络空间延伸、映射。

在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呈现多元互动形态,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模式的并存。多维多位的网络空间信息的互动刺激并塑造着政治认同的模式,使模仿比自然选择(传统和历史积淀)的逻辑强化。具体而言,第一,网络空间中互动性极强的论坛以及极具个人见解传播能量的微博等,驱动着网络空间中行为体对社会热点、价值焦点话题或事件的共识的达成,对政治认同产生巨大影响。第二,网络空间的赋权功能给予了不同行为体手握麦克风的机会,进一步拓宽了行为体自我表达的空间,而且极大增强了各个行为体对政治类话题表达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对政治体系的亲疏、爱憎,对政治话题的赞同、驳斥等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反映多元呈现,形成了不同于现实空间的信息互动情景。在这一情景中,政治情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直接影响行为体政治认同倾向与态度的变化。第三,网络空间中图片信息的传递与日俱增,其以直观性、形象化和平面化的表达形式吸引网民的眼球,其中涉及国内外文化差异、政治差异的图片和视频,刺激着广大受众的感性体验,并进而影响广大受众的认知判断和认同倾向。

同时,网络空间大数据以其强大的挖掘处理技术,勾勒并呈现了网络空间各参与主体的观点、情绪和诉求等集聚、碰撞所产生的信息网状传播态势,增强了政治认同生成变化规律的信息数据化和可视化特征,从而为发现和表达认同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动态的交互场景。网络空间的互联、共享属性,使得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的变化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之一,其衍生空间的拓展,必然推动国家安全治理的场域扩大,由之前侧重强调现实空间的治理转向兼顾和研判虚拟空间的影响及其对现实空间安全的衍射。

(二)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主体的构成多元层化

受益于互联网的广域传输、多节点开放、快捷廉价、渗透全球等传播模式的影响,以及智能手机上网设备的快速普及,虚拟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联结和呈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一种可见性的公共空间。比如在中国:截止2017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4.1 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 个百分点,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72 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 97.5%,规模达到 7.53 亿,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强化。“CN”域名数增长 1.2%,在域名总数中占比提升至 54.2%,网站总数为 533 万个,境外上市互联网企业数量达到 102 家;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 7.20 亿,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 6.4 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 6.47 亿,使用比例为 83.8%。^①网络空间各类线上线下的连接能力和海量信息服务渗透仍在持续拓展,不仅改变了人际互动的参与主体,而且拓展和强化了政治认同主体的构成,并使其多元层化特征更为凸显。

1. 网络空间中多元多层的认同主体交织并存,政治认同的集聚、碰撞、嵌入甚或冲突态势显现。网络空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建立和扩大了个人、群体、组织、国家等与海量信息的直接联系,使“认同建设的国内互动与国际互动的综合体特征”^②更为凸显。由此,在具有虚拟性、中介性、全球性和公共性特征的网络空间中,多元多层认同主体交织并存,海量庞杂的各类政治诉求、情绪及观点等信息呈网状传播,政治认同的集聚、碰撞、嵌入甚或冲突态势显现。就国际层面看,国家行为体之间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多元多样的观念信息竞相输出,以扩大其国家的网络空间权力、权威和影响力。约瑟夫·奈曾强调“信息并非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早就已有归属的政治空间中进行流动,数据跨境流动以及任何形式的交换,都是在国家间业已存在的政治结构中进行的”^③。由于利益诉求、制度架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政策、制度、理念、价值上的冲突和矛盾在网络空间中交互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纷争延伸至全球网络空间里,大肆宣扬互联网世界的“公开、透明和人权”^④,鼓吹“互联网自由”,大力宣扬美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价值观,并大肆诋毁、渗透对象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鼓动全世界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在网络空间发表意见、分享信息、要求效仿西方选举、民主运动和相应的反政府活动。其中,美国遏制中国的做法最为典型。在网络空间,中国是第一网络大国,拥有的网民数量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美国是第一网络强国,掌控制网权,且其意识形态居于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为了继续独

^①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j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② 郭树勇:“两岸互动与国家认同的重建”,载《博览群书》2005 年第 6 期,第 4-9 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40 页。

^④ 阙道远:“美国‘网络自由’战略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8 期,第 18-23 页。

占网络空间的霸权优势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的全球性、隐蔽性、放大性、瞬间性传播模式及其积极定义政治“事实”^①的功能,极力炒作并不断释放中国为“挑战者”“竞争者”“霸权者”的信息,试图通过制造“中国威胁”的“蝴蝶效应”,来离散和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2018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视中国为“挑战者”和“竞争者”^②。此外,2014年5月19日,美国大力渲染受到来自中国并得到“政府支持的商业间谍”的威胁,是其不择手段的另一有力佐证。这说明,发达国家是网络信息的主要“制造者”^③。掌握着全球计算机和互联网核心技术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将网络空间这一全人类创造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大国竞争、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谋求霸权延续、实现本国利益以及长期兜售西方政治模式的新的战略空间和重要工具。由此,网络空间中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认同的碰撞甚至冲突态势显现。

就国家内部来看,具有主动意识的管理者、经营者、各种权力或资本利益集团、普通网民等网络主体多元并存,这意味着,有各种各样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过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多元裂变不仅影响和改变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且使同一行为体穿梭于多个网络空间成为可能,其网络空间身份的多重性也由此产生。身份多重性造成了“个性化的集体主义”^④与网络个人主义并存,网络空间中各个行为体的表达权被激活,官方的话语空间和民众的话语空间共存。由于利益关注和价值认知的差异,不同行为体之间“利益和价值观冲突日益激烈。”^⑤同时,传统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稳定单一的身份认同被网络空间瓦解,易变性、多重性的主体身份在网络空间实现。受空间角色扮演多样性、流动性、虚拟化的制约和影响,行为体自身身份认知的模糊性、情感认同的泛化与张力、价值认同的匮乏与焦虑等交织并存。影响焦虑的最初来源往往是认同的模糊性和多重性,而网络空间的瞬间效应不断扩大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和相互碰撞的机会,由此,原子化的、多重性

① [英]布莱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s://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③ 王正平,徐铁光:“西方网络霸权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第105-111页。

④ Carol Soon, Randy Kluver. *Uniting Political Bloggers in Diversity: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Web Activis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4,(19),p.50.

⑤ 常晋芳:“从‘私民’到‘公民’——网络空间主体的公共性转向”,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35-39页。

认同主体交织并存。

2. 网络空间中国国家间组织成为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不可忽视的外在主体。一般而言,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主体由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广大民众构成,且政治认同的建构或运作具有极强的国家自主性、可控性和排他性。但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全球性、低门槛性和瞬息性,严重冲击了以地域性为存在前提的民族国家。互联网的广域传输和多节点拓展了国家间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国内问题国际化或国际问题国内化,进而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影响和左右成为可能。而这“必然使具有地缘特色的政治文化及一国国民的政治认同机制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使传统民族国家的对内控制力和对外主体角色遭到进一步的削弱”^①,并因而改变了现实空间中民族国家的安全边界。国家间组织成为民族国家政治认同不可忽视的外在主体,^②使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建构和增进国内政治认同的进程中必需关注国家间组织的影响。

在西方“认同霸权”思维惯性的驱使下,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网络空间技术、话语等方面的优势,试图影响和侵蚀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鼓吹自己国家的政府支持网上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自我标榜西方政党制度符号和价值取向,向发展中国家民众兜售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通过海量传播音像、影视作品等潜移默化的方式加大对西方制度符号、制度模式的宣传力度,试图逐步激发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同时,极力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助推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网络空间的扩散,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政治价值渗透。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得勒就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鼓吹要与“我们的对手”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念。^④其次,栽培和收买所谓“公知”、“大V”以及网络写手,将一些社会突发事件、社会生活矛盾炒作成热点事件,再放大成政治事件,并发表对发展中国家国内事务及制度运作的

^① 周光辉,周笑梅:“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37-46页。

^② 马润凡:“互联网对我国政党制度安全的挑战及应对——基于制度认同的视角”,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1-14页。

^③ 夏自军:“美国‘网络自由’渗透战略的形成及其特点”,载《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3期,第38-49页。

^④ 王永贵:“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交锋的基本特点”,载《理论探讨》2006年第2期,第13-15页。

倾向性评论,来传递其对发展中国家制度架构及其政治运作的不认同倾向,以期激起国内敌对情绪,进而削弱民众的权威认同和制度认同,引发联动效应。第三,让网络空间信息按照美国的需要“自由流动”,意图削弱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

可见,具有工具中性特征的互联网,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成为了国家利益凝聚的新场所,并产生了“非中性”作用。这种“非中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西方霸权国家将其作为对外行为的重要手段,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最终实现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①在网络空间中,怀揣政治渗透意图的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不可忽视的外在主体,发挥着否定或解构国内民众原有认同和引导新认同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3. 网络空间中“永远在线”且又处于价值形成与重建阶段的年轻网民规模庞大,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认同主体。网络空间参与主体的数量增长与年龄结构层次下降的“反比”特征明显。以中国为例,具有数字消费热情的30岁以下的年轻网民群体高达4.08亿,占整体网民的73.0%;就年龄层面看,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到30.0%,10-19岁群体占比为19.6%;就学历层次看,以初中、高中/中专/技校为主占比63.3%,其中网民中学生占比为25.4%,初中学历网民占比2016年增长0.6个百分点。^②这一群体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速度快、能力强,参与公共活动的主观意愿强烈,但其政治认同倾向不够稳定。而网络空间中大量渗透着西方国家价值符号的新闻、影视、广告和网络游戏等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和影响年轻群体。在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激烈碰撞下,思维方式、认知方式、认同取向等容易受互联网形塑的年轻群体,其行为由于信息快捷而变得模仿风行、自我理性程度下降,并由此成为不可忽视的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的新主体。其中,受具有架空世界观的小说、漫画、游戏作为主要载体的“二次元”网络文化的快速渗透和影响,^③青少年行为的虚拟化与不确定性等风险出现。

在西方国家一直将培养和异化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认同,作为实现不战而胜

^① 郑志龙,余丽:“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61-70页。

^②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zfzyj/hlwzxbg/hlwj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③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zfzyj/hlwzxbg/qsnbg/201608/t20160812_54425.htm

的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下,西方文化在网络空间中以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海量涌现。生活和交往场域的变化使得人们接触到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文化特征,其行为观念会逐渐被同化。“永远在线”且痴迷于西方文化、音乐娱乐和分享洋节喜悦的年轻网民,必定面临着网络空间持各种立场的西方制度文化、价值、符号等信息的裹挟和刺激。在西方文化海量刺激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弱化的强烈对比中,年青一代网上虚拟认同与线下实现认同的矛盾张力扩大,甚至更愿意相信和依赖虚拟空间中的互动,而对现实空间尤其是政府抱有成见。在特定条件下,这种认同张力更容易在新媒体的放大、聚集和催化作用下迅速发酵,引发对本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认同动摇和支持转移,使政治认同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对国家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政治认同主体既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客体,其构成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方法和对策的制定与实施成效。在网络空间大数据迅猛发展的当下,政治认同主体构成的多元层次态势对国家安全治理的层次性、系统性、精准化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来源交互渗透

认同形塑于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并通过符号生产、记忆塑造、意义重构和表达行动等机制发生作用。而认同建构和扩散过程的行为基础有两种机制:社会学习和社会影响,社会学习强调个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相互作用,从其他人那里获取知识;社会影响是指一些人或机构依靠其力量或权威向其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①同时,认同建构和扩散的渠道或场域主要有社会网络和大众媒介两种,其中媒介的影响效力更大。

在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受掌握政治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权力和能力的制约,民众政治认同的生长多来源于传统经典和历史积淀,依赖于权威、精英、专家等的宣传、灌输、引导和强化,其建构过程的“精英—大众”单向性特征明显。在此政治认同建构和传统模式下,历史记忆对建构和增进政治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历史学习教育和情感唤起也成为形塑政治认同的主要方式。受时空有限性的制约,认同的辐射和扩散仅仅局限于熟人社会网络中,且主要以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载体的单向传播为特征,传受双方无法实现随时随地双向沟通。

网络空间则用强大的技术加速了主体间交往互动的全球化进程,成为观念和

^① Rowers, E.M. and D.L. Kincai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Rowers, E.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行为传播、扩散的主要载体。人际间的互动、影响和扩散对于观念和行为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且个体所处的网络特征以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新的观念行为在网络中的传播扩散。互联网裂变式的发展和大数据信息的迅猛传播衍生出了具有更多主动获取信息、平等交流公共事务、裂变式传播的网络空间和交互平台,如网络新闻评论、网络论坛和社区、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带来了“认知视角的平等化、认知身份的平等化、去经典和权威化”等一系列认知层面的转向,^①大大提升人们的认知发现能力。数字化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的根本特质,其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传播效应裂变化以及信息双向互动的瞬息性,使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体能够同时拥有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且身份能够零成本地瞬息切换。由此,不同类型的交互平台以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变革着人们的思维言行、交往交流方式,从而成为政治认同的新的来源机制。其中,开创了人际互动新模式的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移动社交网络的认同辐射优势更为明显,其多项交流互动的传播特点,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其便捷的“点赞”符号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各个自媒体空间里,“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理解和判断,自主地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并传播给周围的人,从而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

网络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信息环境,各个行为体在其中与信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网络空间能够调动用户,快速提供大量信息,并缩小用户之间的距离,这使其较之其他类型的政治空间显得更为独特。^③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影响着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其“‘观念分配’表现出倾向性、多样性、可变性、扩散性和可塑性”^④,尤其是“社会认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为内容的观念分配,对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影响日益加强”^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正向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建构现实空间的国家政治生活秩序,而负向的政治认同则会

^① 闫奎铭,孙雍君:“大数据时代的认知转向及其对科研管理的影响”,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年第20期,第101-106页。

^② 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2-38页。

^③ Mary McEvoyManjikian. *From Global Village to Virtual Battlespace: The Colonizing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Extension of Realpolitik*[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0,(54),pp.381-401.

^④ 余丽:“全球网络空间‘观念治理’的中国方案”,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0-75页。

^⑤ 高中:“‘国家观念’视野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25-129页。

干扰甚至破坏现实空间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

综上,在现实空间之外,虚拟的网络空间成为行为体观念行为表达和扩散的新空间。在主体间的多中心互动、跨网互动、两两互动中,认同取向的交互渗透、扩散、延伸甚或异化现象产生,从而使政治认同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对国家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的恰适性提出了新挑战。

(四)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序列复杂多变

政治认同是一种综合性的、递进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过程,具体体现为公民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权威认同、价值认同等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层次。在特定的环境里,基于内心诉求和期待的优先次序,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会自主选择 and 排列组合自己的认同需求,从而衍生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有等级层次的且多元并存的“圈层认同”^①。“圈层认同”序列的不同,直接影响并决定个体或群体是否采取参与行为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参与行为,影响认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与机制,“进而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效果和实际运行过程”^②。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人们利益需求的深刻分化以及获得感的差异,认同序列也将重新分化组合。

网络空间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认同序列的内在差异日渐显性化。网络空间中差异化的主体多元存在,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表达愈加清晰而具体。受利益诉求差异、心理期待落差、价值追求多元、历史记忆和现实获得感的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主体对政治客体的认同度由远及近不断递减的情形差异明显,不同认同序列间的碰撞和冲突由此产生。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发生了从政治化向经济化、理论化向策略化、单极化向多元化、概念化向符号化、理性化向感性化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且群体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的地位日益提升”^③。这种多层交叉共存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和支配网络空间和现实行为。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的选择性行为使他们很容易发现与自己见解相似的群体,在网络匿名状态下,群体情绪和观点在不断复制,群体极化现象产生。在认同极化的碰撞和冲突中,行为体间的互动失当,集体无意识的争论或谩骂行为现象随之出现,并“以一种非逻辑的方式制约和导向人类的集体活动,从而使

^① 郭树勇:“论‘圈层认同’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47-57页。

^② 任勇:“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3-24页。

^③ 刘少杰:“意识形态层次类型的生成及其变迁”,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第5-12页。

得一定时期一定社会集体在未曾主动发觉的非理性意识支配下展开活动。”^①

可见,具有多向互联互通特质的网络空间冲击和弱化了政治认同的传统逻辑和序列构成,造就了不同行为体自主选择认同次序的新空间。但是,现实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交织并存,扩大了民众网上虚拟认同与线下现实认同序列的矛盾张力,新旧认同类型分歧、碰撞、冲突、甚或调和的复杂关系网络由此形成。因此,关注和引导网络空间中民众的政治认同序列,将成为国家安全治理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三、应对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变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安全治理的需求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网络空间技术和话语优势,将网络空间作为其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谋求认同霸权、实现本国利益以及长期兜售西方政治模式的新的战略空间和重要工具的客观情势下,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自主性正面临极大挑战。不断增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建构的自主性能力,拓展正向政治认同的集聚空间和辐射效应,是化解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的认同风险的有效方法。网络空间自身并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但网络空间大数据对政治认同变化规律的可视化呈现,为有效建构正向政治认同、调整和优化发展中国家安全治理的提供了重要契机。

第一,发展中国家应树立国家安全治理的大数据思维,推动政治认同建构和整合的理念创新。挖掘海量数据的相关关系,发掘和预测规律,是网络空间大数据的价值所在。数据与信息不仅是网络空间中的核心资源,同时还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更是不同行为体的战略和利益的具体反映。大数据的重要前提是数据的海量性,大数据更重要的是意识革命。^②因此,中国要突破传统的部门思维和小数据时代结构性样本分析的局限,形成大数据整体思维,充分运用中国人口数量带来的用户行为的数据海量性优势,将国家安全治理的推进、政策体系的优化与政治认同的变化有机统一起来,形成“数据治国”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密切关注网络空间大数据的关联性分析,精准聚焦政治现象与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生态领域之间的交互关系,通过多维度、多视角地进行数据分析,将碎片化民意信息汇聚成系统、综合、动态、可视化的民意信息。以此为基础分析和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认同现象和政治认同发展趋势,会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以

^① 宋雅萍:“论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和作用”,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第60-67页。

^② 杜小勇,冯启娜:“‘数据治国’的三个关键理念——从互联网思维到未来治理图景”,第49-61页。

及如何去应对和处理变革时代的认同危机和治理风险等。

第二,发展中国家应及时调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发挥和强化民众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的大数据辐射效应。网络空间大数据其实就是数据汇集的并行化、在线化、生活化和社会化。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已经逐步踏入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全媒体时代,广大民众利用大数据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畅通有效地信息交换,人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分享者,反映某一段时期内民众认同倾向和情感变化的海量数据由此汇聚而成。网状社会使得个体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从一个点可以辐射到整个网络。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不断调适国家安全治理的方式,搭建一个基于政治认同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提升政府实时数据分析能力和舆情研判能力,明晰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政治认同的内在差异以及负向认同产生的根源。同时,科学调适之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建构方式,努力建构公民主体间的认同辐射模式,提升公民自我建构和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拓展和强化反映公民正向认同的大数据辐射效应,有效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的进程。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增强国家安全治理的民众需求导向,促进国内政治认同机制的分类建设。政治认同是影响和支配公民社会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反映了公民从“认知、判断”到“意愿、动机”再到“行为取向”的心理选择过程,对其是否愿意参与或接受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利益诉求多元化和主体构成多元层化的影响,民众认同指向和需求的差异性客观存在,并在网络空间交织呈现。政府管理是网络空间治理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易变性、广泛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实现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有效治理。网络空间安全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国家、社会的着力推动,还需要广大民众的主动接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是要维护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顺应民众需求,发挥民众主体作用,从而形成网络安全治理合力。因此,政府要改变传统的指令导向,深入了解民众的需求,加强政治认同机制的分类建设,以增强有效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在动力。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摒弃传统的指令取向,运用网络空间大数据的创新运用和实时分析,全面感知和预测公众需求的维度及其变化规律,及时反馈并予以精准、个性化的服务,推动民众需求热点问题的实时解决,并不断提升人们的“存在感”“安全感”“获得感”,促进政治认同的不断成长,进而激发不同群体自主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内生动力。

第四,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挖掘国家安全治理的历史记忆,增进政治认同的历

史经验感知。所谓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中以这个群体所认定的“历史”而在群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对往事的记忆。^①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生成的传统根基和历史渊源阐释的延续”^②,它蕴含着人们对自己所在民族或国家等历史经验的认知和感受,渗透在国家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发挥影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内在力量。以中国为例,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由于各国交往的深化,政治制度绩效在国家层面上具有了更大的可比性,而中国制度优势绩效的充分发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这说明了中国制度不仅具有效力活力,也在不断增强吸引力。^③因此,在网络空间不断演进的当下,中国更要通过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制度、文化经验的认知和感受,深入挖掘国家安全治理的历史记忆资源,驱动认同融合。具体而言,一要通过缅怀和重温中国的建党建国历史,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激活民众的红色记忆和政治记忆,增进社会共识,增强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二要通过不断增强政治仪式的有效供给,激发感情共鸣和符号记忆,增进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融合,进而提升和强化国家认同;三要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历史来源,强化价值记忆,凝聚共识,使民众在多元文化境遇下自主传播、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

(作者简介: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郑州, 450001)

收稿日期: 2017年12月

(责任编辑: 赵裴)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

^② 詹小美:“选择与建构:历史记忆固基政治认同的逻辑共生”,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016年第12期,第20-26页。

^③ 杨雪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优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第16-25页。

On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Cyberspace

Ma Runfan

Abstract: Political identity reflects citizen's cognition, emotions and attitudes to the political object and the changes of its elements and forms. These changes directly affect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ecurity. The interconnected Cyberspace not only expands the space of political identity, but also m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identity more prominent (multi stra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identity; mutual infiltration of identification sources; the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of the identity sequenc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hinking inertia and political intention of "identity hegemony"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cyberspace is becoming a new risk factor that affects national security, affecting and stimulating the demand for security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us, firstly, we should set up the big data think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idea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Secondly, we should adjust the mode of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big data to the positive political identity between people. Thirdly, we should enhance the demand orientation of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mechanism. Finally, we should excavate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enhance the experience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Keywords: Cyberspace;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